

经济文化教育学科建设丛书

# 文选钱氏学研究

吴晓峰 陈复兴 陈延嘉/著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# 文选钱氏学研究

吴晓峰 陈复兴 陈延嘉

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## 文选钱氏学研究

吴晓峰 陈复兴 陈延嘉 / 著

---

责任编辑: 董贵山

封面设计: 翁立涛

---

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 
(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)

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 
长春市现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张: 6.875

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71 千字

印数: 1-1000 册

---

ISBN 7-5601-2673-1/O · 198

定价 18.00 元

## 经济文化教育学科建设丛书编委会

主任：刘宪鲁 王栾周 卓越

副主任：杨明 李伯承 赫坚

赵骥民 刘保垣 宗国富

委员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孙振雷 刘琦 李军 李公君

李建华 阳曦 佟远堂 张洪波

吴晓峰 岳淑美 陈新春 杨以刚

赵小平 赵慧君 姜维公 郭淑云

高福顺 翟延慧 翟继峰

## 自序

在当代，钱锺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可谓一部博大精深文化经典，他贯通中外，融会古今，以他独具的文化信仰与学术风格，为中华文化构建了一座真正的瑰丽大厦。其文化价值早为世人所推崇，他对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史记》等古代典籍的研究成果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。而他对《昭明文选》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，他在这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或者是前人未曾提出过的，或者是提出而未予解决的，或者是解决而未能完备的。钱先生以他“独特的文法和广博的实证所得出的结论，自成系统，独有睿见，可谓自成一家的文选钱氏学（陈复兴《文选钱氏学述》，《长春师范学院学报——第四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刊》，2000年7月）。但十分可惜的是，对钱先生这方面成就的研究还一直是个空白。在2000年筹备召开第四届“《文选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期间，陈复兴先生首次提出了文选钱氏学的概念，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注意与肯定。但是当时陈先生仅以“提要”的形式提出并未对钱先

生的“选学”内容、体系等方面作深入探讨，因此，在以后的几年间我们在陈先生的带动影响下，一直致力于文选钱氏学的研究。先后于《社会科学战线》、《长春师范学院学报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文选钱氏学的研究论文。对文选钱氏学的基本体系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认识，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完成了这部总结、介绍文选钱氏学的专题著作，应该说，这是我们在“选学”事业的发展中所尽的一份努力，愿它能够成为“选学”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进一步繁荣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我们提出的主要观点是钱锺书先生的《文选》研究以其独具的特色形成了文选钱氏学。我们所以说他的《文选》研究可以称为“学”，是由于他的研究体系完备、内容广博。认为在体系上大概有五个方面的特点：一、实践性；二、针对性；三、思辨性；四、圆融性；五、开放性。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全、深、新三个特点。这些特点渗透在他的《文选》研究之中，无愧于文选钱氏学的称号。

当然，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，许多观点尚不成熟，但是，我们只想把自己的点滴认识提出来，并通过自己的研究为“钱学”领域的丰富和发展，为“选学”事业的深入发展增添一分力量、贡献一份热情，希望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支持与鼓励；并热诚期待学者的批评，这将是我们的前进的动力。

吴晓峰

2004年7月

## 目 录

## 自 序

- 第一章 文选钱氏学概念的提出及其体系特点  
..... (1)
- 第二章 文选钱氏学的内容特点..... (18)
- 第三章 钱锺书与萧统..... (35)
- 第四章 钱锺书与《文选》李善注..... (54)
- 第五章 钱锺书的《文选》评点..... (85)
- 第六章 钱锺书的连类举似法 ..... (126)
- 第七章 钱锺书论陆机《文赋》“方圆”问题  
..... (156)
- 附录一 文选钱氏学述 ..... (169)
- 附录二 钱锺书论刘勰及其理论批评 ..... (173)
- 后 记

## 第一章 文选钱氏学概念的提出及其体系特点

钱锺书先生被誉为“一代鸿儒”、“文化昆仑”。“钱学”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。在横亘于中华大地的昆仑群山中，钱先生对《文选》学的研究可谓一座耸入云天的高峰。惜乎攀登者少，这实在是一件憾事。

统观钱先生的全部学术成果，他对《文选》学的研究，完全可以称为“钱氏文选学”，或“文选钱氏学”。为此，“选学”家陈复兴先生首先提出了“文选钱氏学”的概念，发表了很好的意见。陈复兴先生说：“钱先生以他独得的文法和广博的实证所引出的结论，不仅圆融周至，而且自成系统。故可谓之文选钱氏学。”“标志着现代文选学研究的真正崭新之阶段”。<sup>①</sup>但是由于陈先生当时只是以“提要”的形式提出，并未展开详论。本书拟从不同视角、不同侧面进一步申述之，以探讨文选钱氏学的内涵。

在讨论钱先生研究《文选》可称之为“学”之前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认识问题。

钱先生既没有像李善、五臣那样为《文选》作注，



也没有汪师韩《文选理学权舆》和梁章钜《文选旁证》之类的专著，更不要说如周贞亮《文选学》与骆鸿凯《文选学》这样全面研究《文选》的著作，甚至连黄侃专门以《文选》为对象的《文选平点》之类的著作都没有，怎么能称为“文选钱氏学”呢？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很自然的，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。

我国某些学人有一种成见，他们重视柏拉图《理想国》、亚理士多德《诗学》、维柯《新科学》、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、黑格尔《美学》和克罗齐《美学》这样一些有详尽系统的大部头理论著作，而轻视很少理论探讨、大半为具体作品赏析之类的札记之作。所以当《管锥编》出版之后，某些人以上述认识为据，认为那不过是一些片言只语，构不成系统，对“钱学”颇有微词。

钱先生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学术成名作《谈艺录》与《管锥编》的写作思想是一致的，可见这是他终生坚持的学术方法。他对“名牌的理论著作”和“鸡零狗碎的东西”<sup>②</sup>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和取舍。远在1962年，他就指出：“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。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，在整体上都垮塌了，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。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，住不得人、也唬不得人了，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依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。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。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，两者同样是零碎的。眼里只有长篇大论，瞧不

起片言只语，甚至陶醉于数量，重视废话一吨，轻视微言一克，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——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藉口。”<sup>③</sup>“大厦”与“砖瓦”的比喻何等贴切，分析又何等精彩！而我们至今仍顶礼膜拜那“唬不得人”的大厦，轻视甚至蔑视砖瓦！他指出：“倒是诗、词、随笔里，小说、戏曲里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，说出了精辟的见解，益人神智；把它们演绎出来，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。”<sup>④</sup>针对狄德罗《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》中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关系问题，文艺理论界展开了讨论，发表了许多文章，对此，钱先生说，中国的七字谚语“先学无情后学戏”已经概括得十分精辟，“狄德罗的理论使我们回过头来，对这句中国老话刮目相看，认识到它的深厚义蕴”，“作为理论上的发现，那句俗语并不下于狄德罗的文章。”难道不是这样么？发现这个事实并不简单，它包含着历史考察和辩证分析，是非常有独创性和启发性的。他说：“这种回过头来另眼相看，正是黑格尔一再讲的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。对习惯事物增进了理解，由‘识’转而为‘知’，从旧相识进而成真相知。”<sup>⑤</sup>钱先生还强调：“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容易被忽视和遗忘，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。”<sup>⑥</sup>显然，他这样做，完全是一种认识上的自觉行为。除此之外，还与他的学术道路有关。他说：“研究美学的人也许可以分为两类：第一类人主要对理论有兴趣，也发生了对美的事物的兴趣；第二类人主要对美的事物有兴趣，也发生了对理论的兴趣。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。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，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

文艺史。”<sup>⑦</sup>他又说：“我想探讨的，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。”<sup>⑧</sup>所以，当上世纪40年代有人请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著作时，他拒绝了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：（1）他认为理论大厦终将垮塌，因此不愿意为此而花费时间和精力。（2）他重视的是“木石砖瓦”，但不是所有的“材料”，而是“可资利用的好材料”。（3）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好材料，但缺乏研究和整理，他就是要从“微言”即精微的“三言两语”中“演绎出来”“精辟的见解”，这是当务之急，他当仁不让。（4）他的“原始兴趣”中出现的问题是“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”的动因。（5）他“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”的目的，是为了既解决文学作品中的实际问题，又可“作为理论上的发现”，“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”。如果上述认识不误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钱先生学术体系有自己的特点，有的特点很突出很鲜明，有的则不那么明显，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。我们必须打破思维定势，事物是发展的，学术体系的形式特点亦会随之变化。用老眼光看新问题，总是看不顺眼，换一个角度，情况就大不一样。这里的关键是“回过头来另眼相看”，因为它是“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”。这句话，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它是钱先生观察文艺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阐述，我们也应该“回过头来另眼相看”钱先生的著作。钱先生“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，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”<sup>⑨</sup>，我们正是要挖掘出他的“自成一味”来。在此，就文选钱氏学的体系特点作以尝试性的探讨。

我们认为，文选钱氏学之学术体系特点大概有五：

一、实践性；二、针对性；三、思辨性；四、圆融性；五、开放性。分述如下：

一、实践性。理论与实践，本是一对矛盾，学术体系本属理论范畴，谈它的实践性，似乎“不成词”，自相矛盾。这里的意思是，钱先生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，而以实践性为主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我想探讨的，只是历史上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。”这句话看似平常，却是对他的学术研究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，包括了以下三方面信息：（1）限定了研究对象——文艺。（2）这文艺是“具体的”，指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。（3）他要“探讨”，要“鉴赏和评判”，这就离不开理论。这三方面的信息总括成一点，就是以实践为主。

具体的文艺“鉴赏和评判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：首先要确定具体的文艺现象存在与否；“然后寻找解释、鞭辟入里的解释。”<sup>⑩</sup>验之于钱先生的“选学”研究亦完全适用，仅举“解释”一例。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未收入《文选》，后人议论纷纷，钱先生独进一解，颇启人神智。据《晋书》本传和羲之次子《王凝之传》，知“羲之所‘奉设’，乃‘五斗米道’”，即天师道，王氏世奉“张鲁‘鬼道’”。“盖羲之薄老、庄道德之玄言，而崇张、许方术之秘法；其诋‘一死生’、‘齐彭殇’为虚妄，乃出于修神仙、求长寿之妄念虚想，以真贪痴而讥伪清净。”<sup>⑪</sup>昭明离羲之不远，当了解这一点，比后人之妄加臆测，钱先生之解当更有说服力。这样的例证太多，《谈艺录》和《管锥编》的全部文字都可证明以实践为主的特点。现在的问题是：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？它的优点是什么？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？在上文已做了部分回答。还要指出的是，钱先生对架空的贴标签式的文艺批评十分不满，对于那种给中国的作家作品贴上西方文艺理论标签，诸如屈原是浪漫主义，杜甫是现实主义，“白居易‘极喜’李商隐诗文，是由于‘嗜好矛盾律’……不作出真正的解释，而只赠送一顶帽子，给予了一个封号甚至绰号”<sup>⑩</sup>的做法，嗤之以鼻。他要求“作出真正的解释”，这就不是空谈理论所能办到的，而必须以实践性为主，即对一个个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做出真正符合黑格尔说的“这一个”的解释。

为此，他采取了学术札记的形式，又有极大的突破和发展。在《谈艺录》四中，他说：“俄国形式主义论宗许克洛夫斯基论文谓：百凡新体，只是向来卑不足道之体忽然列品入流。诚哉斯言，不可复易。窃谓执此类推，虽百世以下，可揣而知。”他又说：“名家名篇，往往破体，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。”<sup>⑪</sup>他的《谈艺录》、《管锥编》正因破体而恢弘。敏泽先生指出：“在文体上他也突破了历来札记的‘纂辑’、‘摭拾’之类的局限，合义理、考据、词章而一之……把传统的札记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。”<sup>⑫</sup>他的文体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诗话、笔记之基本无理论，又不同于西方条分缕析之理论著作，而是贯通古今、融会中西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模式，即以实践性为主的理论模式。对此，应给予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评价。钱先生此种理论模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其作用会逐渐显现。正由于他反复探讨的只是具体的文艺

鉴赏和评判，他的理论原则才反复地得到证明，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。一旦离开这些“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”，理论也不存在了。这正如钱先生所说：“可与‘剥葱’之喻比勘。易卜生一名剧中主角号‘自我之帝皇’而欲觅处世应物之‘自我’，则犹剥玉葱求其核心然，层层揭净，至竟无可得。”钱先生之理论体系亦应如是观，如去掉其实践性，则“犹如层层剥揭，内蕴核心，了不可觅。”<sup>⑧</sup>

二、针对性。钱先生之选学研究有极强的针对性。这一特点与“实践性”有密切的关系。他不撰写“高头讲章”，不空发议论，而是针对存在的问题，在有创获时随机发难：或纠讹错，或补不足，或发人之未发，月旦是非，皆有的放矢。没有自己的见解，决不下笔。他研究的都是“问题”，不是“问题”者，则不涉及。比如《文选》的编者，是萧统，还是刘孝绰？这是近年来由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教授提出而引起争论的，钱先生则没有谈及。

《文选》学的问题很多，钱先生研究的选学问题也很全面，而选学研究的最大缺憾是对《文选》文本文艺学研究不足，所以他关注的重点也在这方面。千余年间，研究《文选》自有文学研究之成分在，但或为入仕之敲门砖，或为考据之资粮，也是不争之事实。此种倾向，至二十世纪仍有重大影响，在《释文盲》中，钱先生说：“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，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。好多文学研究者，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，竟毫无欣赏和鉴别。”并调侃地用了一个比喻：“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，恰等于皇帝时代，看守后宫，成日

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，虽有机会，却无能力！”<sup>⑥</sup>言语够尖刻的了，却刺不破“文盲”那厚厚的皮肤。想想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一些文学批评，就可了然。正是针对这些问题，他强调要“莫逆”“诗眼文心”，及“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”<sup>⑦</sup>。如在《求通亲亲表》中，曹植说：“每四节之会，左右惟仆隶，所对惟妻子，高谈无所与陈，发义无所与展，未尝不闻乐而拊心，临觴而叹息也。”《文选》李善注引《汉书》中山靖王胜闻乐而泣事，何焯批曰：“悱恻动人，颇似中山靖王《闻乐对》。”钱先生指出：“连类故事，未为漫浪；抉发文心，殊嫌皮相。”为什么这么说？查《汉书·中山靖王传》，刘胜朝见汉武帝在建元三年，吴楚七国之乱早已平定，刘胜未参与叛乱，未受到追究，但他有兔死狐悲之感。“心结日久”。曹植不被信任，中山王刘胜亦有遭谗言，不被信任之感。故“连类故事，未为漫浪”。但曹植此文所表述的心境，乃“申众里单身之感”，与刘胜之处境和心情都大不相同。而曹植的心境却与李陵相仿。故钱先生引李陵《答苏武书》比之：“独坐愁苦，终日无睹，但见异类。……举目言笑，谁与为欢？……左右之人，见陵如此，以为不入耳之欢，来相劝勉，异方之乐，只令人悲，增切怛耳！”此“与人为群，在己无偶”才“与植齐心之同声矣”<sup>⑧</sup>。可见李注、何批确实“殊嫌皮相”。

把握作者意图固然重要，但不可执着而参死句下，因为有时作者意图与作品实际功效可能相背。昭明《陶渊明集序》云：“白璧微瑕，惟有《闲情》一赋，

扬雄所谓‘劝百而讽一’者，卒无‘讽谏’，何足摇其笔端？惜哉！亡是可也。”“北宋而还”，多人诘难。钱先生指出：“昭明何尝不识赋题之意？惟识题意，故言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。其谓‘卒无讽谏’，正对陶潜‘有助讽谏’而发；其引扬雄语，正谓题之意为‘闲（防闲）情’，而赋之用不免于‘閒（闲适）情’，旨欲‘讽’而效反‘劝’耳……事愿相违，志功相背，潜斯作有焉”<sup>⑩</sup>。而今我们不同意昭明对《闲情赋》的批评，因为《闲情》跳动着一颗鲜活的心，充满着生命的诗意。但我们不能不承认《闲情赋》“志功相背”的客观效果。钱先生并不是为昭明的封建礼教观点辩护，他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事实。而这是符合现代阐释学原则的，伽达默尔说：“解释学过程的真正现实，在我看来包含着被解释的东西和解释者的自我理解。”<sup>⑪</sup>“自我理解”不同正是文学欣赏经常发生的事。钱先生的“作者之宗旨非即作品之成效”的观点是针对评析《闲情赋》提出的，亦可见其针对性的理论依据，决不是单纯的就事论事。那么，钱先生为什么引述“北宋而还”的众多批评呢？他说：“批评家对旧传统或风气不很认识，就可能‘说外行话’，曲解附会。”<sup>⑫</sup>而这种情况太多了。从这些论述里，可见钱先生的针对性是很广泛的，不应该只理解为只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。

三、思辨性。钱先生认为，欣赏诗文要“悟”，即直接面对文本，去“悟”，不受前人看法之左右，不带成见，没有任何理论上的承诺。这与西方形式主义的现象学方法相通。但钱先生并不排斥理性的思辨，决



不停留在“悟”上。他指出，执着于“悟”，亦可成迷。在“悟”之后，他特别强调理性之思辨，“黑格尔”、“辩证”之类的词在其著作里经常出现，思辨性是钱先生学术的一大特点。在《管锥编》中，钱先生以《论易之三名》开篇，拈出一字多意可“同时并用，‘合诸科’于‘一言’”之汉字特征，后在全书中随文阐释，反复申说。他指出，“一字多义，粗别为二。”“一曰并行分训”，“二曰背出或歧出分训”，在句中，有时“必须拈一弃一”，有时“则均同时合训，虚涵二章”。钱先生之谈训诂，乃为谈艺：“语出双关，文蕴两意，乃诙谐之惯事，固词章所优为，义理亦有之。后将随文阐说，兹拈二例，聊畅厥旨”<sup>②</sup>。钱先生所拈二例，非直接谈《文选》，今以《文选》之例证之。扬雄《解嘲》：“客徒欲朱丹吾毂，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。”“赤族”之解，学人聚讼。《汉书》颜师古注：“宋祈曰：见诛杀者必流血，故云‘赤族’。”王念孙《读书杂志·汉书》一三：“宋祈曰：‘窦贖云：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，如赤地千里、赤贫，赤族言尽杀无遗，颜注谬。’”钱先生指出：“赤地”也，其词负，谓并无草；“赤贫”也，其词正，谓空有室。“‘赤’兼净尽与殷红两义，以前义施本句之‘族’，以后义应前句之‘朱丹’”，即“双关”，前人之争“如以肝胆为胡越矣！”<sup>③</sup>这种思辨，非仅对一字多意之理解，更重要的，关乎现实、历史的复杂性和人类心理的复杂性，“心理事理，错综交纠：如冰炭相憎、胶漆相爱者，如珠玉辉映、笙磬和谐者，如鸡兔共笼、牛骥同槽者，盖无不有。赅众理而约为一字，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